

日治时期日本神道在台湾的传播与局限

蔡锦堂

(淡江大学历史学系, 中国台湾)

摘要:日本神道于日治时期在台湾的传播,带有浓厚的双面性格——一方面似乎具有日本传统信仰的“宗教”性格,另一方面又呈现出代表国家仪典的强势“道德”风格。如此双重性格,加上日本治台所谓“同化”政策的虚幻性,以及统治者、被统治者双方对“宗教”观点的差异性,造成日本神道在台湾、特别是被统治阶层间的传播,呈现出无法生根落实的面貌。

本论文除陈述具有“国教”地位的日本神道教,在日本治台50年间传播的轨迹,并藉此解析日本神道教无法在台湾社会“土著化”的原因。

关键词:日本神道;神社;传统宗教;国家神道

中图分类号:B98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007(2004)04-0027-08

一、前言

日本明治维新之后,日本政府为了塑造以天皇为国家统治顶点的天皇制国家,以宗教配合政治目的,由上而下、人为地创出了“国家神道”。国家神道是以日本传统由下而上的神道教信仰,掺入政治要素加工蜕变而成的。因此它一方面具有日本传统神道教信仰的“宗教”性格,另一方面又呈现出代表国家仪典的政治性“道德”风格。具有双重性格的神道教,于1895年以代表统治者“国教”之姿态进入台湾后,开始于全台各地陆续建造神道教的象征建筑——神社,展开日本神道在台湾的教化事业。但是此一具有国家力量介入支持、附带浓厚政治色彩的“宗教”,在台湾推展五十年却无法生根落实,终于随日本统治政权的溃败而消散,究竟其原因何在?

本小论基于笔者先前的研究,再作一综合整理,焦点着重在追溯日本治台五十年间,日本神道教传播的轨迹,并藉以探索其无法在台湾社会“土著化”的原因所在。全文共分五节,除前言、结论外,其他三节首先论述日本神道概说,从传统日本神道的历史沿革谈到明治维新后国家神道的崛起,用以理解日本神道教的宗教传统,及其加入国家政治因素后的质变。第三节追寻异变为国家神道后的日本神道在台湾展开的施为与内容。第四节则探索解析何以使国家政治力量支撑的神道教,无法植入台湾民众的内心信仰深层,其局限的原因究竟何在。(本文所指日本神道仅限于神社神道、国家神道,而不包含教派神道。)

二、日本神道概说

(一) 神道的历史沿革

收稿日期:2004-05-25

日本神道的成立与日本的民族文化生成历史合而为一,它是因日本的风土而成长的自然发生的信仰,与一些由某一教祖的言行为中心而展开的宗教有所不同。对日本人而言,它是传统文化的一端,也是生活的一部分。它是一种“宗教文化”,抽离了日本的风土与民族文化,神道却无法独自成为宗教,这一点与佛教超越民族文化而拥有自己的体系截然不同。

“神道”一词初见于《日本书纪》——成书于公元720年的日本古历史书之一。《日本书纪》中评三十一代用明天皇为:“天皇信佛法尊神道”。另外,评大化革新时的第三十六代孝德天皇,亦有“尊佛法、经神道”一词。由此来源,日本学界认为“神道”一词于八世纪初期始成一般用语,且“神道”与“佛法”对照使用,显见当时为因应外来宗教——佛教的输入,而引发日本人对日本传统神祇祭祀的自学,因此采用“神道”一词,以表征日本的民族宗教。至于之所以会使用“神道”二字,或许亦是受到当时中国所谓“道教”的影响。

日本神道的神观念属于多神教系统,对山川神灵等行自然崇拜、相信灵魂不灭,算是具有浓厚原始宗教性格的民族信仰。其后随着部族联合国家、统一国家的出现,氏族制度日趋发达,国家体制亦渐整备,各部族或皇室的守护神(氏神)、祖先神以及国祖神,除了仍保有其氏神的机能外,同时亦发展成为国家与全体国民的守护神,接受全民众的崇拜。七世纪大化革新时,日本采用中国的律令制度,参照中国的国家仪礼,但也创设了中国制度中所没有“神祇官”(担当国家神祇祭祀的官厅),为日后的政教关系埋下了引线。

日本神道崇高的地位开始产生变化,是在六、七世纪佛教传入日本,接受国家的保护,成为镇护国家的宗教以后的事。奈良时代(公元710~794年)佛教以国家宗教之尊,到处广设“官寺”,受国家祭祀的神社(神道教祭祀神的社殿及其境内场域全体圣地)亦配置僧侣,开始了“神喜佛法,佛拥护神”的所谓“神佛习合”——神祇思想与佛教信仰融合的情形。平安时期(公元794~1185年)中叶,十世以后,出现了所谓“本地垂迹说”的论点,认为佛是神的“本地”(本体),神为佛之“垂迹”(化身),佛为救众生,因此在日本以神的化身出现。此后,指称某某神为某某本地佛之化身的对应关系层出不穷,其中以日本皇室祖先神“天照大神”(神道界众神之核心所在)为佛教真言宗系统“大日如来”化身之说最为著名;而神道仪礼或神社管理由僧职人员担当的神社数亦不少。此种“佛尊神从”的状况持续了近一千年,直至十九世纪末明治维新的“神佛分离”时才告结束。

但是这种借用外来佛教思想为主体,以说明神道现象的情形,一方面也刺激了神道界内部,因此有了试图以神道本身为主体来说明神道现象的学派的出现。譬如南北朝时代(公元1336~1392年)的伊势神道学派,主张万物的根源在于《日本书纪》神话中所说的“混沌”,诸神、佛以及人均出自于此“混沌”的神。该学派极重视日本古代传承的“禊”(肉体的外清静)与“祓”(内心的内清静),强调“禊”、“祓”乃与神合而为一的方法。伊势神道学派真正的目的,其实在保持神道的主体性,主乡神主佛从,用以摆脱佛教式的神道。之后室町时代(公元1338~1573年)吉田神道学派提倡唯一神道的理论,主张宇宙根本神格在于《日本书纪》中的国常立尊,森罗万象皆因此神而起,儒教譬如一棵树的枝叶,佛教为花与果实,而神道才是根与杆。

进入江户时期(公元1600~1867年),出于禅门亦是朱子学大家的山崎暗齐,集伊势、吉田神道的大成,提倡神、儒一致的垂加神道学说,试图以朱子学、阳明学等儒学的立场,理解神道并融合二者。他同时亦热烈主张尊皇主义,提倡国民应诚心拥护皇室,“忠”为最高的道德。他的主张对幕末的尊皇倒幕运动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江户时代长期的太平盛世,导致研究日本古典文献学的“国学”风气大增,而在神道研究方

面则有追求日本民族文化主体性“复古神道”学派的出现,此学派的代表者为国学者本居宣长与其继承者平田笃乱。他们经由古典的研究、理解,主张应回归古神道精神,并确定日本皇室祖先神天照大神在日本神话中的中心地位。他们认为人世中所有的事象,均是因神的意旨而展开,每个人均须在神所委托的各自岗位上努力工作,是为人生之道。自此之后,复古神道的神国思想成为幕末尊王论思想的基盘。明治维新之后,明治政府亦承继此思想,实施神佛分离,并使神社从属于国家,形成皇室崇拜的国家主义神道。

(二) 国家神道的展开

公元1868年明治维新以后,明治新政府在“王政复古”的大号令下,以“诸事神武创业之始”^①之理想,树立天皇为中心的新政府,并根据“祭政一致”的国是精神,进行国民国家的再统合。于此之际,推动“神祇祭祀的独立”乃是不可缺少的一个环节,而“神佛分离”令就是在这样的情形下发布的。在“神佛分离”令下,神社中的社僧被迫还俗、神社中的佛教礼仪遭废止、本地垂迹说被否定、本地佛、佛教经典、佛具悉数被清除于社外——明治新政府试图将神社中的佛教要素抹除,以恢复一千多年前神佛习合以前的模样。在这样的背景下,民间乃有了“废佛毁释”的强烈举动。

公元1871年(明治四年)明治政府宣布“神社为国家的宗祀”,并在“大教宣布”^②的敕令下,进行“惟神之道”的国民启蒙布教活动。同一时期,明治政府亦恢复古时神祇官的设置,并由明治天皇于皇居紫宸殿举行神道式的祭拜天神地祇仪式,亲自呈显敬神典范;除此之外,亦陆续针对神社之社格、祭祀、神职等颁布制度,朝神道“国教化”的路途迈进。在神社的“社格”方面,明治政府参照古制将全国神社分官社及诸社二种。官神分官币社(深受皇室崇敬的神社)有国币社(地方崇敬中心的神社)两类,又各区分为大、中、小三等。官币社由皇室供进币帛、神饌,并由神祇官主祭,而国币社则由国库供进币帛、神饌,由地方官执行祭祀。诸社分府社、县社、乡社、村社,村社之下另有被公认为神社但未拥有社格的所谓“无格社”。各神社可因状况的改变而被列格或升格。另外,奉祀皇祖神天照大神的伊势神宫,因其供奉日本国家最高的“国主神”,是“国家的总镇守”,乃被赋予超越社格的存在地位。1872年,因应祭祀南北朝勤皇忠臣楠木正成的楠公社(位于神户)改称为湊川神社,明治政府乃在官社之上另加一阶古代神祇制度所未曾有的“别格官币社”,以对祭祀为皇室或国家尽忠效力者之神社表示崇敬。在1939年战争期间于历次战役中由各地招魂社改称的护国神社,因奉祀的祭神为明治维新以来为日本新政府、国家牺牲生命者,其性质与一般神社不同,故不赋予社格,但亦公认为神社。

此处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将神社视为国家宗祀,开始神道国教化的过程中,日本政府亦以国家之力新创建了许多以天皇崇拜为主轴、适合国家神道思想的所谓“创建神社”。由于日本传统的神社多以上代氏族血缘集团的氏神,或庄园、乡村等地缘集团的村氏神、产土神,或以山川神灵、五谷丰穰之神为祭神,较少符合国家神道所企求者,为了造成国家神道之既成事实,明治政府乃以国家权力陆续新建与日本传统神社异质的“创建神社”。明治“王政复古”大号令发布三个月后,天皇直接下达建造该社的命令,并亲自捐纳营造费黄金三千两,用以彰显祭神楠木正成于南北朝时对天皇的忠诚,足以为臣民的模范。此后“创建神社”即陆续出现,除上述湊川神社祭祀南朝忠臣的神社系统外,还有靖国神社、护国神社等祭祀为近代天皇制国家捐躯的

^① 神武即日本第一代天皇——神武天皇,此词谓所有政事回复至神武天皇开国当时的政治制度之意。

^② 大教即指神道。明治维新之初为避免一般民众对神道的传统印象,而改采“大教”之名,配合天皇崇拜的神道新教义,以求达到统一全国民众之宗教意识的神道国教化目的。

“英灵”的神社系统,檣原神宫、平安神宫、明治神宫等祭祀天皇、皇族的神社系统,以及明治维新后于新开拓地、殖民地、占领地等建设的神社系统。日治时期台湾所新建的神社(以台湾神社为代表)即属于此殖民地神社系统。这些“创建神社”非常鲜明的将近代日本天皇制国家的价值观呈现出来,同时也被当作体现国家意识、收揽人心、统一民意的场所。

三、日本神道在台湾的传播

明治政府于公元 1895 年占领台湾之后,隔年即于帝国议会提出以国费于新领地台湾创建神社的议案。1901 年台湾神社以“台湾总镇守”、社格官币大社的地位镇座完成,祭神为大国魂命、大己贵命、少彦名命等所谓“开拓三神”^① 以及征台时死于台湾的北白川宫能久亲王。之后每年除祭典之币帛神饌外,日本政府另提拨高额国费与台湾神社,并定 10 月 28 日台湾神社例祭日为全岛休假日,由天皇敕使或总督及以下文武百官前往参拜。台湾神社于创立之时,即已脱离日本传统的神社性质,完全成为国家祭祀的场所,受到国家的保护;而日本国家神道也藉由台湾神社的创建,筑起了它在台湾的滩头堡。

继此之后,总督府藉着行政力量亦开始于全台各重要地方(包括基隆、新竹、台中、彰化、嘉义、台南、高雄、花莲港、台东、澎湖等)建造神社,祭神即以台湾神社的北白川宫能久亲王及开拓三神为主,明确的凸显出国家神道创建神社的色彩。但是同一时期,日本传统的神道信仰,亦随着日本人的移入台湾,而在台湾逐渐传播开来,譬如台中的稻荷社、高雄与基隆的金刀比罗神社等。这些神社供奉着日本传统信仰的农耕神、商工业神——仓稻魂神以及司航海安全的金毗罗神——大物主神、崇德天皇^② 等。这些神社多由一般日本民众募资建筑在日本人聚落中,初期带有浓厚的日本传统宗教性格,与“创建神社”异质,较不受国家行政的干涉,因此除了后来被收编改制的高雄与基隆金刀比罗神社^③ 外,这些神社的社格均较为低下,或者甚至在行政上只被冠以“社”之名而不被公认为“神社”。^④

公元 1934 年,因战争的逐渐扩大与时局的紧迫,台湾总督府在这一年祭出“一街庄一社”的神社建立方针,并提出所谓的“神社中心说”——以神社为社会教化中心的理论。^⑤ 在此之前全台湾为总督府公认的神社约只有 25 所,另外奉祀日本神祇供民众参拜但不为政府认可为神社的所谓“社”,则约 99 所(半数左右设于“蕃地”)。经过总督府与神职者的一番“努力”,到 1945 年全台湾的公认神社共 68 所,另含约 116 所“社”与 12 所“摄末社”。^⑥ 对照起 1934 年以前在台湾建造的神社数,后期已有相当的进展,不过如按“一街庄一社”之规划理想,以终战时台湾的下级行政区域共有 67 街 197 庄,毕竟神社的数目还离规划有一段差距。这是由于地方神社营造、维持费用之调度困难,物资、劳力以及神职人员均因战事白热化而大为欠缺所致。

进入 1930 年所谓“十五年战争”期^⑦ 以后,为了推展国家神道以达成天皇制国家的目标,总督府方面除了在台湾各地方广建神社,作为地方社会教化的中心外,亦大力动员官衙职员、

① 此开拓三神均为日本神话中与国土开拓、征服、经营有关的神灵,三者均为从属于日本皇祖神天照大神的征服神。

② 金毗罗即梵语之蛟龙、龙神之意,主司航海安全。神佛习合后,因《古事记》中的大物主神乃照亮海之神,故被当作金毗罗神。而十二世纪的崇德上皇于平清盛保元之乱后被放逐赞岐并死于当地,之后被合祀于金毗罗宫,为当地海上航行者祈求航海安全而受尊崇。

③ 打狗(高雄)与基隆的金比罗神社后来均被收编,增祀能久亲王等,因而改为高雄神社(县社)及基隆神社(县社)。

④ 根据神社相关法规,“社”被定义为“非属于神社,但奉祀神祇为公众参拜之建筑物”。这是因为日本政府认为神社须具有一定的规模,而且本殿、拜殿、社务所、鸟居、手水舍、神林等相关建筑或设备,始不致有辱神道之名。一般之“社”多因财力关系而难符合官方要求。

⑤ 有关“一街庄一社”及“神社中心说”,参阅蔡锦堂(1992:211—224)。

⑥ 摄末社即摄社与末社。摄社为不论祭神从属关系,神社的籍贯隶属于本社而接受本社管理者称之。末社为与本社之祭神有本末关系而隶属于本社管理之神社。两者制度上均无法独立存在。参阅蔡锦堂(1994:141—143)。

⑦ “十五年战争”指从 1931~1945 年之战争期,此词为日本学者鹤见俊辅提出,颇适合用来解释此一时期之历史。

学校教职员、学生、青壮年团、妇人会、部落振兴会及一般民众去神社“勤劳奉仕”(清洁、打扫、劳动服务等)。无论是神社的营造、改建、铺路或神林的树木栽植等,都少不了这些团体的劳动付出,因为一方面可以节省经费,再者可以经由“奉仕”,加强团体成员与神社、祭神间精神信仰的连系。最显著之事例为1941年“台湾总镇守”台湾神社的改建工事及“台湾的靖国神社”台湾护国神社建造工程之“勤劳奉仕”。此二者均由总督府出面动员在乡军人、防卫团员、男女青年团员、保甲壮丁团员、学生、官公署员、银行会社员、一般人民等,组织成一班各二十名左右的“奉仕队”,进行神社建造的盛土、均地、土石搬运、植树等各项工作。奉仕队每日的作息含:早晨的台湾神社参拜、升旗典礼、宫城遥拜、默祷、训话等,以及午后作业后的降旗、台湾神社遥拜等。透过这些奉仕队,总督府等于是在战线后方组织民众,进行锻炼身心的集训。

神社参拜是推广国家神道重要的一环。1919年4月台湾教育令公布时,即已于公学校规则中明定台湾神社例祭日时,应集合学校师生参拜或遥拜奉祀北白川宫能久亲王的神社,并由校长进行有关台湾神社的教诲。此规定虽以祭祀能久亲王的神社为对象,但至终战止全岛68所公认的神社中有60所奉祀着能久亲王,其效果可想而知。特别是进入1930年代战争期,神社参拜的要求已不限于公学校,而广及于各级学校,甚至青年团与其他团体。台湾铁道部也于1937年9月起实施台湾神社参拜团体车费打折优待;而基隆神社则对参拜者给予参拜纪念章,参拜百次持有一百个章者可至市教育课换取银奖章、千个可换取金奖章。神社的参拜人次,根据资料1938年、1939年各有约八百三十万人次,而1941年则有一千二百万人次。此数据精确度如何未知,但如以当时台湾人口约五、六百万比较之,此数目亦不能不谓庞大。不过如再比照相关资料,此参拜人次中应以各级学校及青年团、保甲壮丁团、妇人会等等团体之定期(如神社月次祭的月例参拜)团体参拜占大部分。

总督府于各地方建造神社、鼓吹神社参拜的同时,亦打出“国有神社、家有神棚”的口号,希望各家庭内安置“神棚”(即神龕),供奉伊势神宫及地方神社“大麻”(即神社的神符,用以代表祭神降临保护全家平安)。此措施乃冀望当神社成为社会精神信仰中心的同时,供奉“大麻”的神棚亦能成为民众家庭内信仰的中心,使日本神道信仰能渗透进入每个家庭生活。1933年总督府藉举行神宫“大麻”的颁布仪式,正式以行政力量介入“大麻”的普及行动。1936年第17任台湾总督小林跻造亲自参加“大麻”的颁布仪式并发表训词,提出:“无论所信宗教为何”,为达成皇民的信念,各家庭之神座均须奉祀神宫“大麻”,以作为祭祀皇祖神的圣坛。透过总督府、州厅、市郡、街庄各级行政官衙力量的介入,并动员警察、学校教员与各地神社神职者,将“大麻”送往各家庭,并要求民众早晚祭拜。

日本神道教在台湾的传播,除了以上所述建造台湾神社等创建神社、收编传统信仰的神社、要求对神社勤劳奉仕、神社参拜,以及供奉神宫与神社大麻外,另外亦藉由教育系统中的“教育敕语”及国语、修身、国史等教科书,传达国家神道的“信仰”、“理念”。根源于日本氏族历史文化、风土的神道教,不同于佛、基、回等宗教,并不具有教祖以及经典、圣句。但是1890年发布的“教育敕语”,形成了国家神道“隐性”的经典。“教育敕语”以儒教的家族主义为基础,强调“忠孝一致”、“忠君爱国”乃是教育的基本。根据此敕语,天皇不仅是国家、政治上的主权者,也是国民道德、思想的中心,此外“教育敕语”又将日本传统的敬神崇祖与对天皇的忠诚结合在一起,成为国民教化的目的。这一套基于国家主义式教育理念产生的教育敕语,透过学校仪典中校长等对全校师生“奉读”(恭读),发挥了莫大的效果。同时再经国语、修身、国史等教科书内容阐述皇灵、神祇、神社间的关系,使政教一体的观念广植于一般国民心中,一方面传播了

国家神道的信仰,更重要的是以达到从内部支撑天皇制国家的目的。

四、日本神道传播的局限

日本神道以如同“国家宗教”的姿态,随着日本统治者君临台湾,藉由官方力量的介入,建造了台湾神社等多数神社,并鼓吹台湾民众参拜神社,进行、“勤劳奉仕”,以及在家庭内供奉“大麻”等。但是外表一度“强势”无比的日本神道,随着日本统治政权的离去,也迅速在台湾销声匿迹。这一点当然与战后台湾国民政府清算日本治台时期有形无形遗产的政策有所关联,但更重的是日本神道在台湾的传播自有其局限性,因此它无法如同其他宗教在台湾(特别是台湾人社会中)落地生根,甚至连类似日本史上江户时代初期“隐秘式基督徒”^①的隐藏式存在亦不可得。

探讨日本神道教在台湾传播的局限,首先要注意的是如同第二节所述,日本神道教乃源自于日本的历史文化与风土,脱离了原生土壤后是否能在异地存活,必须依赖一些因素的配合以及宣教师的努力。神道教“有幸”于明治维新后受到新政府的眷顾,从长期历史上“从属”于佛教的地位,一跃而成为准国教的身份。但是神道长期历史上的“弱势”已相当程度根深蒂固的为日本民众所认知,虽因新政府撑腰而一时崛起,但短期间内难具国教之威权,特别是当它面对佛教势力冲击的时候。佛教自传入日本以后,挟其完备的经典、教义、仪式,成为镇护国家的宗教,而神佛习合、本地垂迹的理论出现后,更加强了佛主神从的印象。到了江户幕府时代(公元1600~1867年),日本又因为排斥基督教而实施“寺请制度”^②的缘故,佛教地位更加近似国教。明治维新后的拉抬神道、废佛毁释,虽然对佛教造成局部打击,但终于失败。一般日本民众及政府官员佛教信徒众多,由于佛教的势力尚存,造成日本神道迈向国教的路途更加坎坷。

“信教自由”的保障,也为神道的国教化带来了莫大的困扰与阻碍。强调“王政复古”、初期具有相当复古色彩的明治政府,为了与欧美列强并肩,开始于教育、文化、思想、国民生活诸层面全盘导入欧美的新文明,此即所谓“文明开化”的风潮,而“信教自由”亦是其中的一环。1889年2月发布的“大日本帝国宪法”第28条,明定“日本臣民于不妨碍安宁秩序与违背臣民的义务下享有信教之自由”,此后日本政府的“公式见解”即持续声明日本并“无国教制度的存在”。但是实质上天皇及皇室每逢国家大事必以神道祭祀仪式祭告皇祖皇宗,而神道国教化的诸种措施,亦在政府的支持下继续推动。换言之,帝国宪法中近代性、文明开化性的“信教自由”与复古性、政教合一性的政府现实作为之间,存在着相当程度的矛盾。为了淡化这一矛盾,并解除政府推动神道国教化的困扰,日本政府因应所谓“神社乃国家宗祀”之说法,强调神道“非宗教”,并一举将神道归属于日本民族“道德”的层次,于是所有日本臣民无论宗教信仰如何,皆须敬神崇祖,崇祀惟神之道。

神道乃属“道德”层次而“非宗教”的说辞,虽部分化解了佛教、基督教等对神道“国教化”的抵制与“信教自由”的质疑,但也因此替日本神道及神职人员与民众之间筑起了一道藩篱。神道教由于接受国家、政府的保护,创建神社更是自筹建到维持,多依赖政府的经费挹注。这种自上而下创建的神社,一开始便不须刻意经营其“信徒层”,却能顺利存在。正如同日本官方所

^① 即日本史上所谓的“隠れ切支丹”(切支丹为基督徒之意)。在1673年岛原之乱与江户幕府锁国令颁布之后,天主教就受幕府禁止,但九州平户、天草地方的日本人信徒却隐秘式地行宗教集会,或在佛龕的后面隐藏祭坛,伪装成佛教徒,但却祭拜“玛利亚观音”。

^② “寺请制度”是江户时期为使庶民证明自己并非天主教信徒而是佛教徒,因此须有所属寺院,形成檀那寺与檀家关系的制度。此一制度使寺院成为庶民登记“户籍事务”的类似机关,也是幕府对庶民支配的重要据点。

谓的神道乃“非宗教”，确实神道教自朝向国家神道之途迈进以后，便逐渐失去了“宗教”应有的活力，与民众、基础信徒层划下了一道鸿沟，两者之间失去宗教信仰的连系，反而多出国家意识形态的羁绊。日本神道教虽无佛教、基督教之教祖、经典与整备的仪式，但受到佛教的影响，也在长期发展的历史中，形成了属于自己的一套仪典，并模仿佛教讲说佛典的方式，展开了神社与信徒间“讲”的信仰组织。十二世纪以后，如伊势、熊野等著名神社的神职者“御师”，也开始与地方民众结成师檀（御师、檀家）关系，组织“伊势讲”、“熊野讲”，将伊势信仰、熊野信仰渗透入地方的农民层。神社藉由“讲”的组织，超越了地域的隔阂，让地方民众有一生至少一次到伊势神宫、熊野大社等具威灵的神社参拜、并取得“神札”（神符）而归的愿望。

因为“御师”的努力，祭祀日本皇室皇祖神天照大神的伊势神宫，在进入十二世纪后，也从国家镇守神格的伊势信仰，逐渐扩展至农村成为兼顾五谷丰稷的农耕神，之后随着时光的迁移，其庶民性日增，终于发展成为具有福神性格的“利益信仰”。这是日本历史上神道教神职者“御师”努力透过“讲”的组织与庶民接触，并宣扬神道信仰，让神道信仰更具亲民性而与庶民、土地结合的例子。反观明治维新后神道国教化的施为，国家、政府对神道多方保护、支持的结果，即抽走了神道于庶民层间因信仰关系所应建立的基盘，而神职人员也因“神社乃国家宗祀”、“神道乃属道德层次而非宗教”之崇高看板，质变成为配合国家政府的国家仪典的主持者，失去了宗教信仰传播者的亲民性。日本神道教在台湾的推展，也因为上述基本缺失的影响，使得神道教如同沙中的楼阁，根基欠稳固。

神道教中属于日本传统信仰的神社（如祭祀仓稻魂神的稻荷神社或祭祀大物主神等的金刀比罗神社），亦随着日人统治而进入台湾，这些神社部分为政府收编而成为国家神道的一翼，部分仍维持原日本传统神社信仰的特质，但社格或建筑设备、规模均较低下，且这些神社大多建造于日本人群集的聚落，其信仰圈未能跨越日人聚落而进入台湾民众的社会。换句话说，这些日本传统信仰的神社，带有浓厚的保守性与封闭性，台湾岛民非其族类，无法轻易被纳为神社的“氏子”（祭祀同一氏神者）。由此一端亦可看出日本治台时期所谓“同化政策”的虚幻性。

别外，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对于宗教信仰观点的差异，也是造成神道教无法在台生根落实永续发展的要因之一。基本上神社的建造有其一定规范，特别是受政府公认的神社，必须要有本殿、拜殿、鸟居、社务所、手水舍以及“镇守之林”，且坪数亦有规定；神社大多建造于幽静之处或山岗上，离尘嚣稍远，并于境内广植林木，塑造适合参拜的肃穆气氛。相对于神社周遭的环境，台湾岛民传统宗教信仰的寺庙，则多建于街坊市集人口熙攘的地点，寺庙除了是台湾人宗教信仰的中心，亦是社会交际、娱乐、资讯交换传递的绝好所在，因此它没有静寂肃穆的气氛，即充满庶民的世俗喧哗与生命力，没有神林的清幽，但富香火的缭绕。更重要的是，台湾民众对于神佛参拜的热诚常取决于祈求事项的灵验与否，台湾民众是利己主义的，合乎自己利益且祈求应验神佛，方能成为信仰的对象。而国家神道要求人民参拜神社，希望人民祈求的无非是攸关国家、天皇、政府之事或战争的胜利，个人及亲属的利益只是从属附带而已的。这种强调对国家、天皇忠诚的国家信仰，与一般台湾庶民的灵验、利己性宗教信仰，存在着绝大的差距。神社参拜似乎已经不属于宗教信仰的领域，而是国家仪典要求中的一部分；当“国家”要素一旦抽离，仪典亦随之消散，缺乏台湾庶民宗教信仰基盘的神社或日本神道，因为无法“土著化”，只能自台湾这块土地上消逝。

五、结论

1945年8月日本帝国宣告无条件投降,国家神道亦随之结束了近80年历史。该年12月15日占领日本的联军最高司令部(GHQ)发布了所谓“神道指令”的备忘录,命令国家与神社神道完全分离,实施废除国家神道的政教分离措施。隔年神社神道登记为宗教法人,全日本国大部分神社(约八万所)均纳入组织,并设立神社本厅,统辖神社事宜。自此日本神道教以一平常宗教身份再度出发,无法再享有国家、政治上给予的特权,也无从再强制人民参加神道教的行事、祝典、仪式。但是,失去了国家政治力的干预,日本神道相对得以迎接恢复其传统信仰面貌的契机。越过了1950、1960年代日本战后的复兴期,日本民众再度认识了与乡土历史文化、风土并存而立的氏神镇守神社的意义,神社每年一次镇座大祭或春秋祭典,不论农村或都市、年长或年少者均积极的参与;而每年元旦的“初诣”(新年第一次至寺社参拜)及日常的神社参拜亦次第增多,神社再度成为与日本历史风土合为一体的地方神圣象征之一,也回复成为地域住民超越世代的生活共同体的安身立命场所。传统信仰的神社如是,而明治期后所建造的具国家神道色彩的创建神社,去除了国家政治力的羁绊后,也被纳入一般神社的组织。这些神社虽无法全然褪除与国家、皇族关系的性格,但亦逐渐出现与庶民信仰或利益信仰合流的迹象。例如每年东京明治神宫“初诣”人潮总是全日本属一属二的,这样的情形多少解释了创建神社的变迁状况。

相对于日本国内,在台湾由于政权的更迭,日治时期的创建神社、一般传统信仰神社或社,均遭到铲除或改建的命运。譬如“台湾总镇守”台湾神社(1944年加祀天照大神而改称台湾神宫)被拆除重建为具有另一政权势力介入的圆山饭店;有“台湾靖国神社”之称的台湾护国神社,改筑成奉祀为中华民国牺牲捐躯“英灵”的国民革命忠烈祠;祭祀郑成功的开山神社恢复为延平郡王祠;而其他的神社或成为学校、公园、地方忠烈祠用地,或被拆除而消失。理所当然的,原本具日本历史风土性格的神道教,离开其原生地域移植至新领土台湾,由于国家政治力的介入,已使它失去了传统宗教信仰的养分与活力,虽然一时兴荣,但毕竟缺乏民众信仰的基盘,其随着统治政权的消逝而枯竭,乃是可意料之事。

[责任编辑 明道]

Shinto: Its Spread and Limitation in Taiwan under the Japanese Occupation

Cai Jintang

(Department of History, Tanchiang University, Taiwan, China)

Abstract: The spread of Shinto in Taiwan under the Japanese occupation shows its dual character: a traditional Japanese religion and an intensified “morality” representing Japan’s national ritual. Owing to such character, together with the occupation authorities’ unreal policy of “assimilation” and the discrepancy between the ruling and the ruled strata in their attitudes toward “religion”, Shinto was spread among the ruled stratum in Taiwan, but it could never be rooted. The article enunciates the fifty-year spread of Shinto which is Japan’s “state religion”, and analyzes the reason that Shinto could never be localized in Taiwan.

Key words: Shinto, shrine, traditional religion, the state Shinto